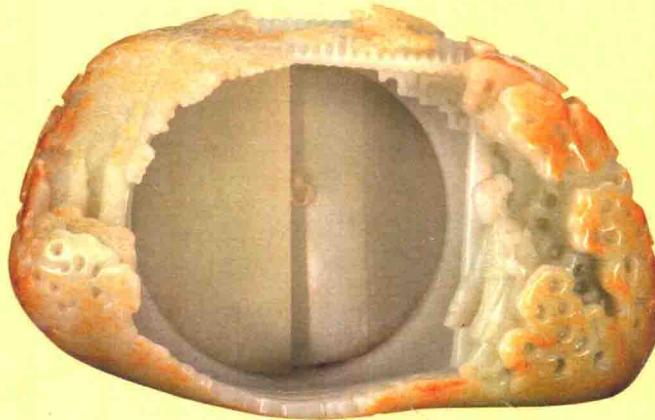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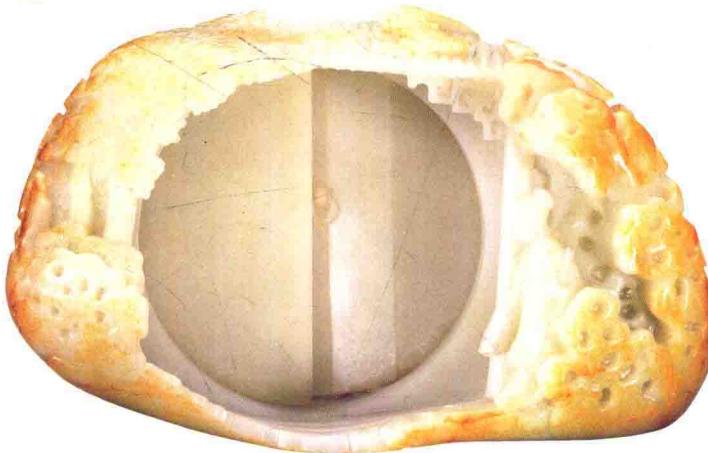
故宫经典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JADE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玉器图典



故宫博物院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故宫经典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JADE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玉器图典



故宫博物院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宫玉器图典 / 许晓东编著. —北京 : 故宫出版社,

2013.11

(故宫经典)

ISBN 978-7-5134-0501-0

I . ①故… II . ①许… III . ①古玉器－中国－图集

IV . ①K87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2333 号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 单霁翔

副主任 李季 王亚民

委员 纪天斌 陈丽华 宋纪蓉 冯乃恩 胡建中

闫宏斌 任万平 杨长青 娄玮 宋玲平

赵国英 赵杨 傅红展 苗建民 石志敏

余辉 张荣 章宏伟 尚国华

故宫经典

故宫玉器图典

故宫博物院 编

编著: 许晓东

摄影: 冯辉 刘明杰 刘志岗

图片资料: 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

图片编辑: 周耀卿 关剑波 杨喆

责任编辑: 梅婷

整体设计: 王梓 廖晓婧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毫米 1/12

印张: 25

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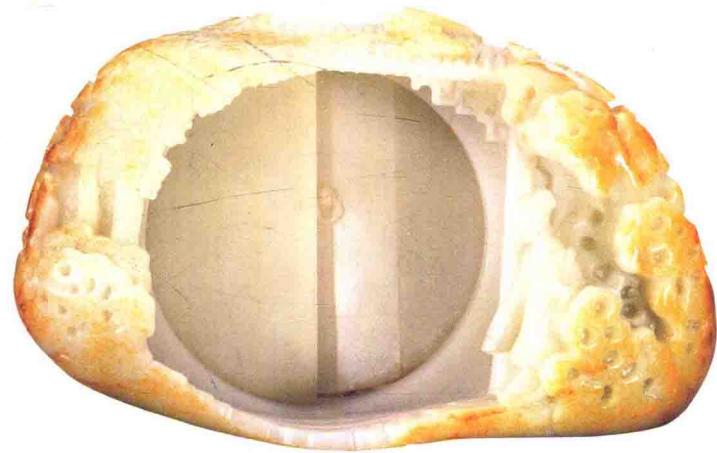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978-7-5134-0501-0

定价: 360.00元

故宫经典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JADE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玉器图典



故宫博物院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宫玉器图典 / 许晓东编著 . —北京 : 故宫出版社,

2013.11

(故宫经典)

ISBN 978-7-5134-0501-0

I . ①故… II . ①许… III . ①古玉器 - 中国 - 图集

IV . ①K87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2333 号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 单霁翔

副主任 李季 王亚民

委员 纪天斌 陈丽华 宋纪蓉 冯乃恩 胡建中

闫宏斌 任万平 杨长青 娄玮 宋玲平

赵国英 赵杨 傅红展 苗建民 石志敏

余辉 张荣 章宏伟 尚国华

故宫经典

故宫玉器图典

故宫博物院 编

编著: 许晓东

摄影: 冯辉 刘明杰 刘志岗

图片资料: 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

图片编辑: 周耀卿 关剑波 杨喆

责任编辑: 梅婷

整体设计: 王梓 廖晓婧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毫米 1/12

印张: 25

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978-7-5134-0501-0

定价: 360.00元

经典故宫与《故宫经典》

郭欣璐

故宫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经典文化。从故宫的地位、作用及其内涵看，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宫、皇权为核心的帝王文化和皇家文化，或者说是宫廷文化。皇帝是历史的产物。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核心。同样，以皇帝为核心的宫廷是国家的中心。故宫文化不是局部的，也不是地方性的，无疑属于大传统，是上层的、主流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堂皇的部分，但是它又和民间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故宫文化具有独特性、丰富性、整体性以及象征性的特点。从物质层面看，故宫只是一座古建筑群，但它不是一般的古建筑，而是皇宫。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聚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学术、艺术等积累的结晶，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就像金字塔之于古埃及、雅典卫城神庙之于希腊一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故宫文化是经典文化。

经典具有权威性。故宫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它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可替代的。经典具有不朽性。故宫属于历史遗产，它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蕴涵着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创造和精神，具有不竭的历史生命。经典具有传统性。传统的本质是主体活动的延承，故宫所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

与今天的文化建设是相连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

对于经典故宫的诠释与宣传，有着多种形式。对故宫进行形象的数字化宣传，拍摄类似《故宫》纪录片等影像作品，这是大众传媒的努力；而以精美的图书展现故宫的内蕴，则是许多出版社的追求。

多年来，故宫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好的图书。同时，国内外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故宫博物院编写的好书。这些图书经过十余年、甚至二十年的沉淀，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故宫经典”的印象，成为品牌性图书。它们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模糊起来，而是历久弥新，成为读者心中的故宫经典图书。

于是，现在就有了故宫出版社的《故宫经典》丛书。《国宝》、《紫禁城宫殿》、《清代宫廷生活》、《紫禁城宫殿建筑装饰——内檐装修图典》、《清代宫廷包装艺术》等享誉已久的图书，又以新的面目展示给读者。而且，故宫博物院正在出版和将要出版一系列经典图书。随着这些图书的编辑出版，将更加有助于读者对故宫的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故宫经典》丛书的策划，无疑是个好的创意和思路。我希望这套丛书不断出下去，而且越出越好。经典故宫藉《故宫经典》使其丰厚蕴涵得到不断发掘，《故宫经典》则赖经典故宫而声名更为广远。

目 录

005 / 中国古代玉器功能的延续和嬗变 许晓东

017 / 故宫博物院藏玉器精品

294 / 图版索引

300 / 后记

Contents

013 / Chinese jade: inheriting and transforming of its functions Xu Xiaodong

017 / Plates of jade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296 / Index of plates

300 / Postscript



中国古代玉器功能的延续和嬗变

许晓东

玉作为石之美者，受到中国人的重视和喜爱，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其出现至少可追溯到 7000 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其使用，更遍及礼仪、宗教、服饰、陈设、器用等各领域。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玉器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但一直为具有特定地位的特定阶层所拥有，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玉器之所以在中国长盛不衰，除却材质之美外，与其长期以来一直为社会上层所推崇和喜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被赋予特殊文化内涵，及其功能的延续和嬗变，有着重要关联。

一 礼制的载体

《越绝书》记载春秋时期一位名叫风胡子的人，在与楚王论剑时谈到：“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¹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生活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段话反映了早期玉器的三个功能：曾作为工具使用，是礼神之物，死后随葬。

诸新石器时代文化墓葬或遗址出土玉器与上述记载可为印证。玉制钺（图 19）、圭（图 21）、刀、锛、斧、凿等，其造型、最初的功能，与石质同类器无二。所谓“玉亦神物”，是指以玉通神、礼神、祭神，是原始信仰、灵物崇拜、图腾崇拜的反映。这一时期作为神物的最具代表性的玉器有红山文化的玉龙、玉人（图 3），良渚文

化的玉琮（图 10）、玉璧（图 11），龙山文化的玉圭（图 17）、玉璋等。这些玉器当时只为氏族中少数具有特定身份和地位的首领所有。玉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发展成为军权和王权的重要标志。可见，玉器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业已步入社会顶层，并在原始的祭祀活动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由父系氏族社会向文明国家礼制社会的过渡阶段。玉器成为礼制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礼制的文化内涵及宗教、哲学观念。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琮、璧、璋、圭、钺、环、璜，成为夏、商、周礼制玉器的源头。《周礼》“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²，即以不同颜色、形制的玉器祭祀天地、四方的观念，为历代所传承。尽管春秋中期以后礼制渐弛，历代皆有重修礼制之举，但大多奉《周礼》为圭臬。比如，山西侯马晋国遗址等一批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墓葬、遗址，皆出土了圭、璋、简、璜、璧、环、瑗、龙（珑）、琥、琮等玉质祭礼器。汉代皇帝、贵族以玉璧、玉圭、刻字玉牒祭祀宗庙、天地诸神、名山大川、日月星辰。唐代祭祀礼玉包括传统的圭、璧以及圭璧、封禅册。这些礼玉各具功用：圭主要用于郊庙祭祀；新出现的礼玉圭璧，用于郊祀燎祭日月星辰。唐、宋皇帝封禅时用封天、禅地玉册。宋代，祭祀天、地、感生帝、日、月、社稷亦使用璧、圭³、琮⁴、玉册⁵，并有特定的尺寸。

明承宋制，祭祀用玉与宋略同：上帝，苍璧；皇地祇，黄琮；太社、太稷，两圭有邸；朝日、夕月，圭璧五寸⁶。清代仍以黄琮礼地、苍璧礼天、赤璧祭日、白璧祭月，太社、太稷以圭⁷。

战争和祭祀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从上文撮要罗列的历代祭祀用玉可以看到，玉器在祭祀天地、四方、宗庙、社稷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璧、琮、圭的使用，几乎贯穿历史的始终。尽管玉琮在西周、春秋之际已经衰落，且自春秋以来即被改制或作他用，历代对祭祀之琮形制的认识或亦不尽相同，但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理念仍为历代所因循。

除用于祭享天地、四方、宗庙、社稷外，玉器也是朝觐、分封、祭祀等礼仪场合佩带、执携之物，以别等第、彰仪礼。这主要表现在玉圭、玉带、玉组佩的使用上。《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⁸，说的就是以所执圭、璧区分王侯贵族的等第⁹。宋、明时期，圭成为舆服制度的一部分。宋帝于圜丘祭祀天地、昊天上帝，或是于太庙奉太祖、太宗、高宗三位神主之时，或执圭，或执大圭、元圭¹⁰。明代，皇室、亲王在不同的祭祀、礼仪场合，所执之圭不尽相同。皇帝祭祀天地、宗庙服袞冕，永乐三年定玉圭长一尺二寸，剡其上，刻山四，以象四镇之山，即是因循周代镇圭之制。皇帝朔望视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外官朝觐、策士传胪服皮弁服，永乐三年定圭长如冕服之圭，有脊并双植纹。明初，皇帝亲征遣将服武弁服，嘉靖八年定，玉圭视镇圭差小，剡上方下，铭刻篆文“讨罪安民”四字。洪武三年定皇后受册、谒庙、朝会，服礼服，玉谷圭，剡其上，援谷纹。皇太子陪祀天地、社稷、宗庙及大朝会、受册、纳妃服袞冕，朔望朝、降诏、

降香、进表、外国朝贡、朝觐服皮弁，永乐三年定玉圭长九寸五分。亲王助祭、谒庙、朝贺、受册、纳妃服袞冕，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服皮弁，洪武二十六年定玉圭长九寸二分五厘¹¹。可见，明代无论皇帝、皇后、皇太子抑或亲王，其在不同的礼仪场合必须穿着特定之礼服，所执圭之大小、形制、纹饰亦各有等差。而作为皇权象征的玺、宝，历代皆尚玉。清代帝后的谥宝、谥册、徽宝、徽册亦多以玉制作。

玉带制度是古舆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唐代玉带制度最为发达，玉带是唐代礼玉中发现数量最多、最具特征、最受重视的，且绝大部分出于京畿¹²（图56）。唐代对带鎔的质地、环数有严格规定。九环金玉带等级最高。上元元年，“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鑰石带。庶人并铜、铁带”¹³。宋代用带制度亦甚为详备，“有玉、有金、有银、有犀，其下铜、铁、角、石、墨玉之类，各有等差。玉带不许施于公服。犀非品官、通犀非特旨皆禁……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景德三年诏通犀、金玉带，除官品合服及恩赐外，余人不得服用”¹⁴。辽代皇帝服九环带、犀玉带错、玉束带，五品以上金、玉带，六品以下银带，八品、九品鑰石带¹⁵。正因为玉带是唐、宋时期舆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等级地位的象征，所以皇帝屡以玉带颁赐卓有功勋的大臣，金、玉带甚至成为国与国间相互馈赠之国礼¹⁶。明初举凡政治、风俗、社会以古制及唐、宋之制为参考，制定实行。帝、后礼服均系革带。洪武二十六年定皇帝袞冕，革带佩玉，长三尺三寸¹⁷。文武官员公服，腰间所系之带因品秩不同而有

异。洪武二十六年定革带：“一、二品玉，三、四品金，五、六、七品银镀花，八、九品乌角；腰带：一品玉，或花或素；二品犀；三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乌角。”¹⁸传世或出土的明代玉带，带钩的数量以20枚为多（图98）。

玉组佩是将若干玉佩以相对固定的结构组合，系挂于腰带上，是礼制用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周语》“先民有言：改玉改行。韦昭注：玉，佩玉，所以节行步也。君臣尊卑，迟速有节，言服其服器行其礼”¹⁹，即以佩玉节步速、别尊卑。玉组佩制度产生于西周，当时称为杂佩，尚没有固定的结构，多与红色玛瑙、玉髓珠配合串系成组，红白相间，艳丽夺目²⁰。一般而言，身份越高，所使用的玉组佩结构越复杂，玉佩的玉质越好，工艺也越精，反映了古代帝王、贵族佩玉尊卑有别的等级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组佩中玛瑙珠的使用量锐减，多为纯玉饰件组合，或间以其他质地、色彩的珠饰。湖北武汉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挂龙凤纹玉组佩，以整料雕成，分16节，各节可活动折卷²¹。汉代玉组佩与周代不同。广州南越王墓²²、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等西汉诸侯墓，都出土了精美的组玉佩，构件中有玉璜、舞人、觿、出廓璧、龙等，虽然形制各不相同，但均纯以各式玉件配组。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佩玉形制一度失传。曹魏侍中王粲重新制定佩玉之式²³，玉组佩因此出现了新的形制，并为隋、唐所沿袭。此期玉组佩以珩、璜、环为主要构件²⁴。宋代组佩相对复杂，“有衡、有琚、瑀，有冲牙，系于革带，左右各一”。其结构“上设衡，衡下垂带，贯以琰珠。次则中有金兽面，两旁夹以双璜。又次设琚、瑀，下则冲牙居中央，两旁有玉滴子，行则击牙而有声”²⁵。明代，玉组佩再度盛行，且形制、用组佩数量均与宋一脉相承。据《明史·舆服志》，各式礼服皆用玉组佩二挂。皇帝衮冕，玉佩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冲牙一，

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饰云龙纹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皇后礼服用玉组佩与皇帝同。皇太子衮冕玉佩各用玉珩一、琚一、瑀一、冲牙一、璜一；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²⁶。明代帝王、藩王墓出土以及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形制并不完全相同的精美而完整的玉组佩²⁷。始于西周的玉组佩制度，历经汉、唐、宋、明，绵延两千余年，至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后，方始废止。

执圭之礼、玉组佩制度的出现早于《周礼》成书之年代，因《周礼》的记载而更获崇奉。历代儒生奉《周礼》为圭臬，制定一国之礼仪制度，执圭及玉组佩制度因此融入舆服制度之中，并得以延续，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革带的出现虽渊源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非汉家正朔，但在强盛开放、兼容并包的唐代，成为舆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宋、明所承继。发源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入主北京后，时刻不忘其游牧渔猎民族的特性。乾隆帝弘历视玉革带为汉人衣冠，而恐危及社稷，继而弃置不用²⁸，虽可谓数典忘祖，从中亦可管窥舆服制度的确立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和象征意义。玉在礼制社会所处的金字塔尖地位，因此不言而喻。

二 君子比德于玉

以玉为饰，源于人类对美的追求。比德于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则赋予了玉以更深层次的内涵。《礼记·聘义》记载孔子回答子贡何以贵玉贱璫时说，贵玉轻璫并非因为玉少而璫多，而是因为玉被认为是仁、智、义、礼、乐、忠、信、德的体现，而这些美德也是作为君子所应该具备的²⁹。说明早在孔子生活的战国之前，玉便因为其独特的自然属性而被赋予高尚的道德内涵，成为君子修身立行的观照。所佩之玉随行进的步伐发出声音，时时提醒君

予摒除不好的意念³⁰。因此，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德学说形成于东周，成熟于汉代，加之汉儒将西周以来的佩玉习俗给予理论上的阐发和支持，使佩玉进一步制度化。玉器也因此从主要为原始宗教活动的法器，祭祀神灵祖先的祭、享礼器，发展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相对固定组合形式的标示身份、地位的组佩或佩饰。东汉以后玉德观念虽渐趋淡化，但由于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汉儒倡导的“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深入人心，促进了玉佩饰、玉陈设的发展和繁荣。

古代玉饰起源早，使用范围广，造型、纹饰千变万化。举凡首饰（如簪、耳环、戒指、手镯）、服饰（如冠饰、佩饰）及随身携带之物（如剑、扇），均可用玉制作或以玉为饰。这些玉制品既随时代的变化而新品迭出，又可见若干脉络绵延不断。前者如宋、明两代的霞帔坠，明、清时期的纽扣，清代的扳指，均呈一时之风流。相反，诸如玉簪、玉带钩、玉蹀式佩以及始于新石器时代、至唐五代仍流行的梳脊等，则不绝如缕。玉簪是女性的重要首饰。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出现了精美的玉首骨簪。现知最早的玉簪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春秋遗址。魏晋南北朝流行玉笄。唐、五代之玉簪，簪首扁平，透雕花鸟图案，辅以金、银簪铤，对称斜插于脑后，渐趋华丽。明代妇女的鬏髻、头面则由各种金簪或玉簪组合而成，富丽而繁縟。清代最具特色的是耳挖式簪。簪首呈耳挖形，簪身局部装饰透雕盘长、花篮。簪身细长、扁平（图167）。蹀由钩弦护指的工具，发展成为纯装饰的蹀形佩，始于春秋、战国，成熟于西汉（图53）。佩蹀是成人的标志之一。西汉玉蹀形佩的造型、纹饰多姿多彩，为历代之冠。玉蹀形佩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依然流行。宋人视蹀形佩为古玉器，称蟠螭佩。元人称雕玉蟠螭或璩，认为是佩环一类的东

西。蹀形佩于明、清依然盛行，称螭玦、鸡心玦，晚清称鸡心佩。清代玉扳指虽渊源于商、周古蹀，却只盛行于清，且已完全丧失其原有的钩弦护指功能，而仅是男士不可或缺的装饰（图135）。玉带钩是系结绦带、容纳钩环之物。目前最早见于春秋晚期墓葬，钩首、钩身都较扁平、粗短，战国亦然，但钩身弧凸，呈一定的曲线。宋、元墓葬出土的玉带钩数量不多，传世者却不在少数，尤以南宋、元代居多，流行以龙、鹿首、花瓣为钩首（图89）。回弯的钩首距钩颈的距离较春秋、战国时期相对增大。钩身片状、长圆柱形兼而有之，较前代之带钩明显细长。明代玉带钩以龙首居多，清代亦然。明、清时期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带扣，功能与带钩相若。

其他如兴起于宋代、盛行于明、清的玉制文房用具（笔、笔架、笔掭、笔洗、臂搁、镇纸）（图206）、陈设（山子、插屏、香炉）（图214）等，亦无不与玉德学说广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息息相关。玉佩饰、陈设的经久不衰，主要基于人类对美的不懈追求、玉质之美及玉所承载的美好品德。历代玉饰、玉陈设器品类、功能、形制、纹饰的纷繁有别，是玉器顺应时代变迁、时尚流变以及实际需要因时而化的结果。诸如蹀式佩、带钩的绵延不绝，则传达出对古典的崇尚和追慕。明、清时期不仅时做之玉颇为繁荣，把玩、盘摩古玉亦成为文人雅好。对古玉的膜拜，一方面凸显了古玉丰富而厚重的历史内涵，另一方面亦使古玉获得了新的生命。

三 仿古与古玉新诠

由于玉器本身独特的文化内涵，玉器的获得和收藏有着特殊的意义。与青铜彝器一样，玉器的拥有是国家地位的象征，玉器的斩获是重要的战利品，是可以代代相传的

宝物。因此，随葬前朝之玉的墓葬时有所见，最典型的如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以及清初黑舍里氏墓，两者皆藏有数量不等的前朝玉器。

古物的出土、收藏促使了古物的流传，加之社会风尚、帝王喜好的共同影响，仿古玉成为宋以来富有特色的玉器品类。仿古玉主要有两类，一是仿商周青铜彝器，一是仿前朝玉器。同时，古玉的流传意味着其在后世的再利用，这种再利用，既包含对器物的重新切割、改作，也包含整器的再利用。由于时代变迁，古玉和仿古玉所仿对象所处的环境已改变，它们的功能因此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以清代为例，仿古玉或古玉大多被作为陈设、佩饰或嵌饰使用，与其原有的功能已大相径庭。如乾隆八年（1743年）曾命造办处照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制作的白玉仙人、白玉马、碧玉虎，均配做木座作为陈设³¹。

玉琮、玉璧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玉质礼器，是祭祀天、地及先祖之物。商、西周时期玉琮已不多见，战国以后似已不再制作。在江苏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中，一件西周玉琮被配制了鎏金银座、盖，用作容器³²。西汉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玉琮，表面装饰类似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图案，被临时用作墓主的阴茎套，成为殓玉的一部分³³。西汉墓葬出土的玉幔巾上，缀有西周时期的玉饰。创造性地、随机地对前代玉器加以利用，在两周、汉代应不止于此³⁴。

北宋时期，古器物的出土以及礼制改革，引发了金石学的兴起和仿古风潮的出现。礼学因此开始与古器物学相结合而有了一系列古器图的编撰，如成书于北宋元祐七年（1092年）的《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以及传为南宋绍兴间人赵九成所撰的《续考古图》。《续考古图》中收录一件玉琮。四川宋代窖藏出土的青铜、瓷、青石质的琮式

瓶，表明了良渚文化多节玉琮形制在宋代各种工艺中的广泛流行。这些一端封口的琮式瓶，很可能即是当时居室内的陈设器具。清代，乾隆帝弘历很早就注意到了内府收藏的为数不少的良渚文化、齐家文化乃至商、周时期的玉琮，但对其名称、时代、用途已不甚了了。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到五十八年（1793年）间，乾隆帝先后写作了十七首诗对这类特殊的玉器进行考证，并始终认为是五辂、鼓乐异杆两端的装饰，是汉、商、周或更早时期的古物。这类玉器困扰了乾隆五十余年，即使在他最后一首《再题旧玉琮头瓶》诗中，依然隐含着他的疑惑，连他自己都觉得异杆两端如果套装这样的玉石，肩部会感到不舒服³⁵。在清代，这些玉琮有的直接用作笔筒；有的配置珐琅、铜质内胆，有的加底，用来簪插花卉，作为案头清供³⁶；或作为香薰使用。这从乾隆帝御制诗文中称之为“螭头瓶”或“螭头笔筒”亦可为证。从御制诗文中还可以知道，有些玉琮在清代之前已被染色、配制铜胆，或加刻夔、螭装饰³⁷。据此推测，将古代玉琮改作案头陈设的做法，其灵感或来自南宋的琮式瓶。这种做法在明代已经流行。

吕大临《考古图》录玉器16件，其中玉璧一件。清宫旧藏玉璧数量颇多，既有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良渚文化的光素大璧，也有汉代精美的乳丁、兽面纹璧。明、清时期有大量仿战国、汉璧的制作。乾隆帝歌咏古玉璧的诗作达数十首，有的被镌刻于素璧之上。这些古玉璧或仿古玉璧，有的作为插屏屏心，有的配做木架悬挂作为案头陈设，有的随册页保存于紫檀木匣中，有的镶嵌于盒面或如意之上，有的镶紫檀木框作为镜背。室内紫檀香几表面，亦常常镶嵌玉璧以为饰。

春秋晚期开始流行的玉剑具，在战国、汉代非常盛行，北宋《考古图》有录。完整的玉剑具包含装饰于剑柄顶

端的剑首、剑鞘中部的璏和下端的珌³⁸。玉剑具宋以来历代皆有仿制。玉璏在明、清时期又称昭文带。据记载，明人汪珂玉曾收藏元代名士杨维桢的一对紫檀界方，镶嵌汉玉昭文带二，一粟米纹，一卧蚕纹，血蚀殊古而莹润³⁹。表明至少在明代，玉璏已被镶嵌于镇尺之上，作为捉手之钮。尺寸相对较长的古玉璏当时还被用来作为臂搁⁴⁰。清代对古玉璏的利用，既有承继，又有创新。乾隆四年四月十二日曾将原收纳于九顶宝箱中的白玉昭文带三件、汉玉昭文带二件配做紫檀木镇纸五件⁴¹。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又将汉玉五老圆饰、汉玉螭虎昭文带、汉玉桃式饰镶嵌于紫檀木上制作三镶如意一柄⁴²。更多的时候，前代玉璏与其他古玉或时样玉器一道，被收纳于百什件中，成为皇室的赏玩珍品。

殓玉为礼玉之一种。古人认为，金、玉能使逝者不朽。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出现了专门用于殓尸的玉器，主要有流行于两周的覆面以及盛行于汉代的玉蝉、握猪、玉衣等。明、清时期虽然不再以玉蝉、玉猪为殓玉，但也不乏玉蝉、玉猪的制作。一些汉代以及明、清仿制的玉蝉、玉猪，上端钻有小孔，表明这些玉蝉和玉猪当时是作为佩饰或坠饰使用的。此外，玉蝉和玉猪在清代也被收纳于漆盒、木盒或百什件中，当作赏玩之物。元代的玉帽顶（图 86），在明代多作为炉顶使用。明代也制作了为数不少的炉顶。这些元、明炉顶流传到清代，仍然被镶嵌于木质盖顶之上，作为捉手之钮⁴³。宋、明玉带钩，常见被用来镶嵌于木匣表面。以明代光素玉带钩改制墨床、笔掭、佩饰的做法，不仅见于记载，也有实物留存。清代大量实物、文献档案、绘画作品反映出的清代仿古玉及古玉再利用的丰富多彩，是崇玉传统恒久生命力的体现。

四 小结

综上所述，玉器本身材质的特性及其被社会上层所认识和推崇，使之从一开始就与神权、军权的结合，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玉器的礼制功能，在《周礼》中得以系统化，并因汉儒的阐发、倡导以及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而为历代所因循，从而确立了玉器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儒家推崇的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为知识阶层所普遍接受和传承，玉器因此被赋予了更为厚重的人文内涵。这都是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最根本原因。在这一宏观架构之下出现的玉器收藏、仿古、古玉再利用等，延展了玉器的传统功能，为玉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

尽管随着历史的演进，各种材质的装饰艺术，如金银器、瓷器、珐琅、漆器、玻璃器等也都曾风光无限，但玉器的超然地位总体而言几乎从未动摇。玉器在延续其传统的礼制功能的同时，也应和着社会、时尚的变化而改变，并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唐代是玉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受异域文化的影响，实用、美观成为唐代装饰艺术的主流，这一倾向加速了以玉礼器为中心、以丧葬用玉为主流的中国上古玉器传统的改变，开创了以装饰用玉、实用器皿为主流的新时代，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古器物的出土以及礼制改革带来的仿古之风的盛行，因家具的改变而出现的陈设器具新风尚，促进了仿古玉器以及玉文房、玉陈设的兴起。这一趋势历元、明、清而日益彰显。顺应时代的变迁，中国古代玉器在功能的延续和嬗变之间，得以绵延不绝。

注释

1. (东汉) 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卷十一《外传记宝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 463, 页 115,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98 年。
2. (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彥疏:《周礼》卷十八《春官·大宗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 90, 页 336,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98 年。
3. “庆历三年……定祈谷、明堂苍璧尺二寸, 感生帝四圭有邸, 朝日日圭、夕月月圭皆五寸……报社稷两圭有邸, 祈不用玉。”见(元)脱脱:《宋史》卷九八《礼一》, 页 2429, 中华书局, 1977 年。感生帝即五帝之一, 帝王之兴必感其一。北齐、隋唐皆祀之。见《宋史》卷九九《礼二》, 页 2438, 中华书局, 1977 年。
4. 崇宁初“皇地祇, 求神以黄琮, 荐献以两圭有邸。神州惟用圭邸, 余不用。玉琮之制……宜广六寸, 为八方而不剡; 两圭之长宜共五寸, 并宿一邸, 色与琮同。”见《宋史》卷一〇〇《礼三》, 页 2455, 中华书局, 1977 年。
5. “皇帝驾宿明堂斋殿行禋祀礼, 推设祭器, 设玉册于殿陛之间, 乃玉刻金縢宝表文。”见(宋) 吴自牧:《梦粱录》卷五“驾宿明堂斋殿行禋祀礼”, 页 158,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年。
6. (清)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四七《礼一》, 页 1235, 中华书局, 2010 年。
7. (清) 允禄:《皇朝礼器图式》卷一《祭器一》, 页 13, 扬州广陵书局, 2004 年。
8. (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彥疏:《周礼》卷十八《春官·大宗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 90, 页 334、335,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98 年。
9. 璧在汉代也是贵族间贵重的馈赠之物。刘邦在鸿门宴上即以白璧一双奉项羽。
10. (元) 脱脱:《宋史》卷九九《礼二》:“是岁十一月日至, 皇帝服袞冕, 执圭, 合祭天地于圜丘……神宗元丰六年十一月二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执大圭。”页 2441 ~ 2443; 卷一〇二《礼五》:“(雍熙) 五年正月乙亥, 帝服袞冕, 执镇圭, 亲享神农。”页 2489, 中华书局, 1977 年。又(宋) 吴自牧《梦粱录》卷五“驾回太庙宿奉神主出室”条:“(皇帝) 服绛袍, 玉佩, 执玉元圭。”页 157,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年。
11. (清)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六《舆服二》, 页 1616、1619、1620、1622、1626、1627, 中华书局, 2010 年。
12. 刘云辉:《唐代京畿出土玉器》, 页 3 ~ 21, 重庆出版社, 2000 年。
13. (宋) 刘昫:《旧唐书》卷四五《舆服》, 页 1952、1953, 中华书局, 1975 年。
14. (元) 脱脱:《宋史》卷一五三《舆服三》, 页 3564、3565, 中华书局, 1977 年。
15. (元) 脱脱:《辽史》卷五六, 页 909、910, 中华书局, 1974 年。
16. 如南宋遗契丹帝生辰礼, 除金茶食器、衣外, 还有金玉带两条。契丹每次回赐高丽国的礼物有犀、玉腰带两条, 回赐西夏的则有金带、玉带。(清) 万甄:《辽史拾遗》卷十五, 页 23 ~ 25, 光绪元年江苏书局刊本。
17. (清)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六《舆服二》, 页 1616、1618, 中华书局, 2010 年。
18. (清)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七《舆服三》, 页 1634、1636, 中华书局, 2010 年。
19. (三国·吴) 韦昭注:《国语》卷二《周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 406, 页 19,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98 年。
20. 图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3·山西》, 页 94, 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21. 图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10·湖北、湖南》, 页 93, 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22. 图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11·广东、广西、福建、海南、香港、澳门、台湾》, 页 123, 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23. (西晋) 陈寿:《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页 599, 中华书局, 1975 年。
24. 左骏:《魏晋南北朝玉佩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 6 期。
25. (元) 脱脱:《宋史》卷一五一《舆服三》, 页 3529, 中华书局, 1977 年。
26. (清)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六《舆服二》, 页 1616、1622、1626、1627, 中华书局, 2010 年。

2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钟祥市博物馆编著：《梁庄王墓》下，彩版五十七，文物出版社，2007年。
28. 故宫博物院藏一紫檀木云龙纹拜匣，据匣盖所刻乾隆帝御制诗可知，此匣原装玉带鎔。（清）弘历：《题汉玉带版六韵》，《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五集卷四三，册9，页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29.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周礼》卷六三《聘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6，页526、527，台北商务印书馆，1998年。
30.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二九《玉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5，页614，台北商务印书馆，1998年。
3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册11，页634，人民出版社，2006年。
32. 江苏涟水县三里墩西汉墓出土。图见古方等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7·江苏、上海》页83，科学出版社，2005年。
33. 围绕这件玉琮的讨论，见李零《铄古铸金——考古发现与复古艺术》注释26、27，香港中文大学，2005年。
34. 如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以西周玉琮改制的手镯和拱形饰。
35. “虽曰饰竽琳与琅，置肩ancock孰能当……但辇輶既重，加以玉石之坚硬，置异着之肩，ancock惰窳有必然耳。”（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五集卷七十九，册8，页594、5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36. 最详细的研究和讨论见邓淑萍：《故宫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之二——琮与琮类玉器》；《狂飙中的玉琮》，《故宫文物月刊》第2卷第10期总70号，1989年1月。
37. （清）弘历：《咏汉玉鐏头》、《咏汉玉鐏头饼》、《咏古玉搢头饼有序》，《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五集卷十七、卷二十三、卷七十八，册8，页485、612，册9，页59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38. 孙机：《玉具剑与璏式佩剑法》，《中国圣火》，页15～43，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39. （明）汪珂玉：《珊瑚网》卷一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18，页165，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40. （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七《器具》，页315，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册8，页620～624，人民出版社，2006年。
4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汇编》册38，页476，人民出版社，2006年。
43. 稽若晰：《元代的玉帽顶——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白玉秋山帽顶谈起》；王正书：《“炉顶”、“帽顶”辨识》，《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6～276、页277～288，上海博物馆，2002年。

Chinese jade: inheriting and transforming of its functions

Xu Xiaodong

Jade has had a remarkable history in China. It has been appreciated by Chinese people since as early as 7000 years ago. Probably the luminous translucent stone first attracted Neolithic people as something special among a large range of colored and attractive stones that they used for tools and ornaments. Tough but not easily scratched or broken, jade can be ground to a soft smooth surface, intact and gleaning over millennia. It has been worked into symbolic weapons, exceptional ornaments, and ritual objects and applied in various areas of social life. Its use was confined to a very small elite. Though the roles it played and status it represented varied dramaticall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jade represented permanent beauty to its owners and acts as indications of their statuses and ranks. The reason why jade is made so precious to the Chinese lies not only in its physical attributes, but also in the significant meaning it carried, the profound associations it linked, the important roles it played, and in its functional inheriting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time on, jade was chosen for the fine ornament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elites and became associated with their earthly powers. It was also employed for ceremonial and ritual objects that we presume were instrumental in ancient Chinese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so became associated with spiritual powers. Jade has its beginnings in the Neolithic period and was not used evenly throughout at that time. One of the principal jade types of this period is those employed as offerings to the spirits or as

medium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spirits. They were used at ritual and ceremonial occasions. The principal jades include dragons and figures of Hongshan culture (c. 5000-c.3500 BCE), *cong* and disc of Liangzhu culture (c. 5000-c.2000 BCE), *gui* and *zhang*, two kinds of ceremonial blades of Longshan culture (c. 2350– c. 1950 BCE). While the associations of discs and *cong* may have been with something spiritual, the utilitarian shapes of jade axes, some with elaborately embellished fittings, referred to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s derived from day-to-day force. The owners of these jades is restricted to only *shemen* and tribe leaders. Both the Hongshan culture and Liangzhu culture had emphasized jades above all other burial goods. It is also the case in varied distinctive jade cultures scattered at other regions. Therefore it seems quite obvious that jade gained its great reputation and status, and played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fferent societie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From later Neolithic on to early Bronze Age, ancient China witnessed one of the most profound ritual changes. Jade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ions of the new etiquette society, representing profound ritual,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meanings. People modified the use of jade that they ultimately derived from precedents. Neolithic jade forms such as *cong*, discs, axe, *zhang* and *gui* blades, ring for instance, were systematized and employed as a full set of ritual objects, namely six *qi*, though the ideas associated may have changed. Zhou li, one of the three surviving ritual texts thought to reflect Zhou practice reads: ‘the blue *bi* for offering ritual to Heaven,

the yellow *cong* for offering ritual to the West, the red *zhang* for offering ritual to the South, the white *hu* (tiger-shaped pendant) for offering ritual to the East, the black *huang* for offering ritual to the North. Six very dissimilar jades of different colors were linked with directions, the concept which observed throughout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despite of the ritual revolutions now and then. In Han dynasty, jade discs, *gui* blade were employed as sacrifices. *Gui* blade, *bi*, *guibi* (combination of *gui* and *bi*) and tablet consisted of main category of ritual objects in the Tang dynasty. *Bi*, *gui*, *cong* and tablet of certain sizes were contributed to specific spirits respectively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it was almost the same in the Ming dynasty: grey jade disc as offering ritual to the Heaven, yellow *cong* as offering ritual to the Earth, pair of *gui* blades with notches as offering ritual to the ancestors, *guibi* of 5 *cun* in length as offering ritual to the Sun and the Moon. The regulation was followed in the Qing dynasty despite of a little bit changes: as always, yellow *cong* for the Earth, grey disc for the Heaven, red disc for the Sun, white disc for the Moon and *gui* blade for the ancestors.

In Zhou li, jades are considered as belonging to two categories. First are *qi*, ritual jades, as offerings to spirits. Second are *rui*, ceremonial jades, carried when high-ranking nobles meet. Besides those used for ritual purpose mentioned above, many jades wer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human body and with the identity of particular individuals. Jade belts, pendants and hair ornaments were worn as adornment and embellishment, jade ceremonial blades and swords with decorative jade hilts were held in the hand to indicate role or status. In this case, careful distinctions are made between jade appropriate to different ranks. *Gui*, for instance, in Zhou li, 'The wang [king] uses the *zhen-gui*. The gong [duke] uses the *huan-gui*. The hou [marquis] uses the *xin-gui*. The bo [lord] uses the *gui-bi*. The nan [baron] uses the *pu-bi*. *Gui* is carried by Song dynasty emperors on ritual occas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gui* in

different sizes, forms and decorations are allocating to different imperial family members on ritual and ceremonial occasions. Besides *gui*, full set of pendant also acts as sign of rank. Pendants consisted of jades of varied forms and numbers together with agate beads in certain combination mode were prevalent in Western Zhou and Eastern Zhou, still in fashion till Tang dynasty, and revived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pendant worn by high ranking people is normally made of jades of high quality and better finishing. As for the belt, jade always runs top above other materials, such as gold, silver and horn, from Tang dynasty till Ming. Both ornaments and blades would have ensured that a person's rank was recognized by others. Jades therefore belonged after all to particular individuals, becoming with time explicitly associated with given ranks.

Jade has always been valued for its physical attributes: its extreme toughness, which makes it so durable, its incorruptible beauty in terms of color, texture and translucence, and its sensuous tactile quality when polished. The beautiful translucence of the stone and above all its indestructibility, its permanence, were equated with all the qualities of a just man – his benevolence, his righteousness, his good faith. While the attributes of jade are used to elaborate and characterize the qualities of a just man, so jade in turn comes to take on those qualities. That may be the principle reason why jade was chosen as visual expression of morality. With this conception in mind, jade ornaments and jade writing sets are in favor by the noble elites. Jade ornaments such as hairpin, bracelet, ring, belt fittings are in vogue for a quite long time from Neolithic period till today. Other kinds of ornaments, such as *she*-shaped pendant, comb, button, are in fashion for certain periods. Writing sets displayed on desks at scholars' studios come into evidence at least as early as Han dynasty, treasured in the Song, and prosperous in the Ming and Qing. So the ideas that accrued to jade objects are complex. Besides the link with power – the power of an individual of class made visible by